城市形象大使

易湘壬

如是我見

二〇一四年底，第十屆全球城市形象大使選拔大賽在京啓動。該賽事將於二〇一五年全面展開，並於下半年舉行總決賽。據主辦方介紹，這一賽事並非選美比賽，而是在公益的性質基礎上，更考察選手的綜合素質。按計劃，此屆全球城市形象大使選拔大賽，將在中國大陸設置十個賽區，境外設置十個國際賽區，亞洲區總決賽計劃落戶北京，而全球總決賽則計劃十月在上海舉行。據主辦方介紹，此屆賽事的主題爲「美麗夢想，魅力城市」，公益主題則爲「眞愛地球，城市出發。」同時主辦方也透露，賽事的公益合作也將與聯合國千年目標公益主題活動組委會實行全面戰略合作。因之，賽事的公益屬性得到有力支撐，而優秀選手將作爲公益事業的積極推動者和踐行者。

通常，作爲城市形象大使首選的多爲明星。去年十月的一天，在韓國首爾東大門設計廣場，舉行首爾特別市形象大使委任儀式。首爾市長朴元淳在儀式上委任韓國演員金秀賢爲首爾市形象大使。

去年初，「行走日光城」新聞發布會暨拉薩形象大使任命儀式在拉薩召開。我國著名影視演員、心靈公益項目「行走的力量」發起人陳坤成爲拉薩城市形象大使。陳坤多年前就因拍攝《雲水謠》來過西藏，與拉薩結下不解之緣。在此次發起「行走的力量」這個心靈公益項目之初，他把第一年的目的地選在拉薩，選在這個能讓人安靜下來，與心靈對話的地方。陳坤表示：「拉薩這個城市對我而言是充滿神奇力量的，它擁有悠久的歷史、別致的文化和獨特的城市風情。每一次來，我都會更愛這個城市。所以去年的『行走的力量』我們再次回到西藏，今年又回到日光城拉薩。我覺得我現在就是半個拉薩人。」

除了隆重委任的形象大使，一般人，特別是初來乍到陌生地的外地人的心目中，那行駛於大街小巷的出租車司機最能代表一座城市的形象。

長春有位出租車司機，從開出租車第一天起，就留起了大鬍子。爲什麼要留大鬍子呢？他說想法有三：一是與衆不同，讓你見面不忘。二是因爲留了鬍子，別人記住了，就一定要有個良好的服務態度，回頭客就多了。三是很多乘客因爲心急或喝多了酒等，常會遺留一些物品在車上，要讓這些乘客記得車牌號很難，讓我記得這些乘客就更難，可是讓乘客記得這一把大鬍子就容易多了，全長春市大鬍子出租車司機就我一個，再貴重的東西也容易找到啦！

張偉剛到台灣旅遊，在一家賓館門口，他們打車去探望親屬。他拿出預先寫好的地址給出租車司機看，司機笑笑說，這裡是單行路，你們向前走幾十米，到路口右轉彎，在那裡打的士，要省一半的錢，還節省時間。說完，衝張偉剛微微一笑。後來一行人按這位司機的指引走到路口轉彎處，打上一輛的士，第二位司機熱情地把他們送到地方，還下車按響了門鈴，確認他們要找的親屬。張偉剛連說謝謝，司機擺擺手說，你們從大陸來，對這裡不熟悉，咱們是一家人嘛！

每一個相識都是一種收穫

禾刀

燈下集

生於一九三二年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日本戰敗後於一九四六年遷歸「陌生的故鄉」台灣。林文月精通中日語言文字，師從臺靜農，交遊夏志清，身兼文學創作者、學者、翻譯者三種身份。她學識豐富，氣韻生動，文筆典麗，姿態優雅，曾是台大校園裡的一道風景。讀林文月的文章，有如在細密的春雨中，身邊環繞着生機無限的碧綠海洋，一縷縷淡淡的清香不時撲鼻而來，沁人心脾，但絕不濃烈讓人心醉，也絕不牽強做作，哪怕是最爲感懷的憂傷，也能在平實的字裡行間中，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力量。

本書收錄了作者從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三年陸續完成的散文多篇，追記了自己與他人在生命行旅的際會因緣，依次寫了十篇，分別用人物的縮寫代號表示，J.L.、C.、A.、L.、G.、J.、H.、F.、A.L.，以及致M.N.。從人物對象來看，除了身邊的友人，也有日本、美國、捷克、意大利等國；既有同爲教育工作者的教授，也有學生、醫生、護士、作家和售貨員等。

林文月自幼喜歡文學與繪畫，這二者至少有兩大共性，譬如均要求對事物具有細緻深入的觀察力、洞察力，譬如有相當的審美情趣。所以，林文月「觀察人物、描繪人物，也寫作人物」，但絕不泛泛而談。她對人物總是有一定的選擇性，或者說是「審美性」，即便是冷淒的故事，往往也會在隱約中透着一種人性美與善的溫馨。

《A》文寫的是一位日本教授與一家店舖老闆娘長達三十年的地下情，這兩人雖然彼此傾心，但又缺乏衝破世俗的勇氣。於是他們選擇保持一種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特殊關係，直至被教授妻子抓了現形。這也讓女主人公A頓時明白：愛，不一定就是廝守擁有。也所以，最後他們均選擇從肉體上徹底分離。

世上既有因愛而分離，也有擁有收穫的幸福。一旦擁有成爲愛的主要內涵，擁有之外的名頭便不是那麼重要，至少在《G》的那個故事裡。一位曾經的班花，初婚不幸後，在與G那已婚父親相識後，兩人走到了一起。但這種一起的方式違逆了世俗傳統，而G的父親也不想因此而拋棄原配，特別是原配生下的兒女。就此，三人共宿同一屋簷之下。原配有着合乎道德的名聲但無妻子之實，G的母親有妻之實卻要等到原配逝世兩月後，才在法律程序上與父親牽手。數十年的相守，雖沒名分，在林文月看來，這也是一種愛。

林文月在代跋中指出，「我寫作的人物對象，必然是曾經十分關心過，也曾經仔細觀察過的，因而在鋪詞攤文時無法抽離自己，時或不由地投入參與」。這也就是說，她在觀察人物對象時，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人物對象的生活乃至精神世界，在認識他們的同時，一起感受他們的精神世界。

《C》的故事主角是一位救死扶傷的醫生。這位醫生曾經以職業爲榮，當有一天得知身患絕症後，對於這一噩耗，他選擇坦然面對。噩耗也在他的精神世界吹起陣陣漣漪，他不斷反思：「人爲什麼會死，又爲什麼要生？」這一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在C醫生的心裡，也許早就有所參悟，所以他才不想因爲自己的原因，而打亂他人的工作與生活節奏。對他而言，保持常態，讓生活前行，這才是他作爲醫生的最大榮光。

在很多人的眼裡，售貨員是商業力量的重要實踐者。對於商品，「多數人只注重貨色和價值」。長期「沐浴」於這樣一個商業世俗濃郁的環境裡，在馬利歐的門店裡，林文月與女兒卻遇到一位「痴迷於美的職員」。你可以把這位店員看成極擅長推銷，但你無法否認她的鑒賞能力。也正因爲這些專業化的鑒賞能力，她對美的「痴迷」才有掙脫世俗的可能，才有超脫一般營銷的特殊精神價值。這實際也表明，審美並沒有門檻，哪怕是一個平凡的崗位，同樣可以嚼出美的特殊內涵，關鍵在於你對這個職業是否發自肺腑的熱愛，是否努力從中發掘美的蛛絲馬跡。

林文月所寫的這些人物均用縮寫代號表示，這既是對當事人隱私的必要保護，某種意義上，也是生活中的一類人物標籤——他們所代表的是一種精神世界。不過，這並不表明林文月寫他們，就會刻意突出他們的個性。反倒是，從林文月筆下人物的身上以及他們的故事中，讀者看到的更多的是「平凡」二字。平凡意味着許多人均具有故事人物的代入性，平凡也意味着具有跨越時空，穿越文化、民族等鴻溝的特殊能量。

一生富足是讀書

顏純鈎

HK人與事

黃子平有一本《遠去的文學時代》，是復旦大學出版社的「三十年集」系列叢書之一，放在書架上很久了，近日拿出來翻翻，不知爲何，竟先去讀書後的附錄，三篇附錄分別是：「害怕寫作」、「喜歡閱讀」和「那些年裡的讀和寫」。

雖然各人有各人的「讀和寫」，但看看別人的讀和寫，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讀和寫」，又想起，這輩子如沒有那些讀和寫，自己的生命該如何不同。

記憶中看的第一本書，是在南京讀小學五年級時，姑媽從南師院圖書館借回來一本蘇聯兒童故事。我從來沒問過她爲什麼會借那麼一本書回來，似乎冥冥中有種定數，我這輩子要和書結緣，而且要結相當深厚的緣。書名早就忘了，故事也渺然不可尋，只記得有很漂亮的插圖，那麼美的東西，裡頭藏着一個遠方故事，神秘而誘人，從那以後知道書是好東西。

中學母校是閩南歷史悠久的名校，學校圖書館藏書遠近聞名，「文革」前有幾年政治鬆動，大部分文學書、翻譯書都能借到，甚至還有《蘇聯畫報》這種在中蘇交惡後不應該登堂入室的域外來客。《蘇聯畫報》裡盡是張揚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內容，鋼鐵廠出爐的鐵水火花四濺、集體農莊豐收田野上的收割機，大學生摟肩搭背的笑容，以及黑海度假沙灘上的太陽傘和墨鏡。直到後來我們才知道，在那些美麗和幸福後面掩藏着罪惡與悲傷。

當年我母親在小鎮上的醫院裡工作，一個小醫院居然有自己的圖書館，居然還有一位專職的圖書管理員，這簡直有點奢侈，可見那年頭圖書還是一種生活必需品。因爲我們兄弟算是職工家屬，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小圖書館的常客，那裡幾乎有大部分世界名著的譯本，顯見得這個圖書管理員也頗有閱讀品味。我讀蘇俄、英法等國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幾乎都是從那裡起步。千里之外，百年之前，一些異族人的生活，他們的痛苦和我們相通，他們的追求和我們相近，但其中又有那麼多對我們來說是全新的奇異的人生體驗，恰恰是這種對別種生活的好奇，以及這些陌生的經驗中隱含的生命激情和智慧，深深打動了一個懵懂的中國少年的心。

「文革」後母校和醫院的圖書館都毀了，據說有同學用板車到圖書館一車一車地拉走那些「封資修」的「渣滓」。既然是「毒草」，他怎麼還能拉回家去呢？這就沒有人追究了，總之到後來，偶爾經過圖書館，只見空蕩蕩的大堂，滿地垃圾塵土，眞是斯文掃地了。

「文革」後期，紅衛兵們閒散在家，那時是各種「毒草」私下流傳的鼎盛時期，我看過一種香港流回去的小開本精裝翻譯名著，包括《紅與黑》、《牛虻》等等，那麼美的書，感官刺激那麼強烈，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眞是天雷地火，讀完後幾日不得平靜。那些年流傳的書，到最後都破舊不堪，爛菜葉子般，俗話說可以蘸醬油吃下肚去。

那時還有另一種書流傳，叫做「內部書」，據說是中央內部編印出來，給各級幹部讀的，大部分都是政治和理論方面的書，但其中也有幾種大大吸引我們，如《巴黎公社史》、《法國大革命》、《第三帝國的興亡》等等。「文革」後紅衛兵們思想空虛，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讀這類書又引動他們對政治的思索。「內部書」爲何會流到社會上來，這又是另一個疑問了，不過如果老爸是幹部，兒子偷出來看了，看了又傳給朋友，朋友又傳給朋友，傳到天南海北去，老爸也鞭長莫及。

到上山下鄉那些年，清貧的日子望不到頭，精神苦悶時直想撞牆了事，自家的書都讀出霉味來了，而行囊裡文化產品卻空空如也，那種局面眞叫人恐慌。我幸而遇到一個貴人，當年母校圖書館還有一批禁書，被鎖在一個塵封的房間裡，看管圖書館的老師知道我喜歡看書，時常偷偷打開那道緊鎖的門，讓我一個人悄悄進去找書。半天下來，我滿頭蛛網滿手黑污抱着十本八本書出來，悄悄另冊登記，老師千叮萬囑不可外傳，約好下次回鄉全數交還，然後像幹了什麼傷風敗俗的事一樣，低頭疾走回家去。

這些冒着政治風險帶到農村去看的書，成了我在文化蠻荒年月唯一的精神食糧。記得讀《宋詞選注》時，因怕還了書就忘記那些詞，還一首一首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山村裡電燈時好時壞，白日幹農活半個人虛脫，晚上還挑燈夜讀，有時下雨了，滂沱大雨中蜷縮在被窩裡，咀嚼「封資修」的滋味，頗有「雨夜閉門讀禁書」的刺激。在最沒有書讀的時候，我們讀「毛選」四卷裡的註釋，那些註釋有史料，有人物，從字裡行間的蛛絲馬跡裡，揣測政治風雲變幻的來龍去脈，以至後來我們對三大戰役、北平和平解放這些事件都能說出一些道理來，都是拜「餓書」之所賜。

「餓書」的日子直到來香港後才全然改觀，那時，書倒是多到你不敢想像，但看書的時間卻又沒有了——人生之不圓滿，往往又體現在這種地方。讀了那麼多書，文字都有機堆積在腦海裡，那些文字「不安於室」，常常自動跑出來，在腦海裡交戰，那時就到了手癢癢拿起筆塗塗寫寫的時候了。從那時到現在，三四十年過去，讀書和寫作沒有讓我發達，但讓我一生都感覺富足。

滴翠　（攝影）紫　盈

王玉梅的「一字師」

王誦詩

人生在線

著名演員王玉梅一九三四年出生在山東濟南，從影半個多世紀以來，塑造了多位不同個性的「老大娘」形象。

一九六三年，王玉梅在話劇《豐收之後》中扮演一個小腳老太太、村支書趙五嬸，在上海參加華東會演，引起了轟動。這部戲被選送到北京彙報演出，演出結束後，周總理拉着王玉梅的手親切地問：「你多大了？」王玉梅回答說：「我二十八。」周總理風趣地說：「噢，你還是個小趙五嬸喲。」當晚在北京飯店舉辦一場文藝界晚會，周總理邀請「小趙五嬸」跳舞，勉勵王玉梅說：「你演得非常好，以後要多爲人民演好戲。」之後，周總理親自對《豐收之後》部分台詞、劇情做了修改，力促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豐收之後》。

王玉梅一九八一年在影片《喜盈門》中飾演仁武媽，一九八二年在影片《山菊花》中飾演桃子媽，一九八三年在影片《內當家》中飾演普通農村婦女李秋蘭。

一九八三年在電視連續劇《高山下的花環》中飾演梁大娘，一九八四年獲第二屆中國電視金鷹獎和第四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最佳女配角獎。

一九八四年在影片《高山下的花環》中飾演梁大娘，一九八五年獲第八屆電影百花獎最佳女配角獎。

王玉梅塑造的「老大娘」形象樸實自然，親切感人，活靈活現在銀幕上，刻印在廣大觀衆心中。

一九八四年，長影導演陳家林決定邀請王玉梅出演《譚嗣同》中的慈禧，這在電影界不啻是爆炸性的新聞，一個演慣了農村老大娘形象的演員出演驕橫跋扈的皇太后，一下子從吃地瓜雜糧到啖嘗猴頭燕窩，這兩個無法調和的婦女形象怎麼能在一個演員身上體現，簡直不可思議。

但王玉梅決心面對這一挑戰，她說：「我要演好慈禧，我不能放棄演慈禧的權利。」

拍攝的準備階段，劇組請來故宮歷史學家朱家晉講解故宮的風俗、生活、習慣，講解完已經晚上十點多鐘，但王玉梅意猶未盡，把朱家晉請到自己住的房間，向他請教宮廷中的一些生活細節，連續問道：「旗人講話拿什麼腔調，有什麼特色？」「宮廷女人走路什麼姿態？」……不弄明白決不罷休。

王玉梅把設計的慈禧種種形象表演給朱家晉看，穿着花盆底鞋走路，變換着各種姿勢，讓朱家晉評論、選擇。

她進入了角色，念着台詞，朱家晉老人被王玉梅的執著感染了，欣賞她對藝術的一絲不苟，也進入了角色，當她念到慈禧對懷塔布夫人講：「有話說呀！」朱家晉立即叫王玉梅打住，毫不客氣地說：「不，不要帶『呀』，這不符合慈禧的身份，旗人說話也不總帶『呀』，要強調『說』字，『有話說！』」王玉梅心領神會，立即糾正。後來銀幕上出現慈禧對懷塔布夫人講：「有話說！」這三個字，像噴射出來一樣，惟妙惟肖地表現慈禧皇太后頤指氣使、剛愎自用的神態，銀幕效果極佳，震撼了觀衆。

王玉梅在《譚嗣同》中飾演的慈禧，既是太后，又是一個女人；既內心陰險毒辣，又外表親和友善，這一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淋漓盡致地表現出慈禧作爲帝王、太后、女人、母親的全部複雜感情，一九八五年獲第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配角獎。

師生情深　薪盡火傳

孫玉蓉

文化經緯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農曆乙未年正月初五，陳寅恪的弟子、著名史學家卞僧慧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以一百零四歲高齡，平靜、安詳地駕鶴西去了。我們由衷敬重的前輩學者，一生腳踏實地、嚴謹治學、遠離名利的楷模又弱去了一位，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懷念與惋惜。

卞僧慧名慧新，字伯耕，筆名僧慧，一九一二年出生於天津，一九三二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一九三四年轉入歷史系，一九三七年以國難輟學，避禍津門故里，直至一九四六年才正式拿到教育部頒發的畢業證書。在校期間，他曾受業於陳寅恪、雷海宗等學術大師，這使他的才智得以發揮。新中國成立後，他成爲天津市歷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員。改革開放新時期，他作爲天津社會科學院的資深研究員而受到敬重。退休以後，他被聘爲天津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繼續致力於鄉邦文化的研究工作。

在我心目中，卞僧慧先生才是眞做學問的大學者。如今，社會科學研究事業蒸蒸日上，國家級、省市級科研課題比比皆是，課題經費資助爲科研工作提供了便利。可是，這些好的科研條件，他都沒有享受到。他退休後的數十年間，繼續治學的所有費用，全部出自退休金。他的代表作《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的編纂工作都是在退休後完成的。因爲年邁行動不便，他不能常到單位圖書館和市內各大圖書館去查閱資料，所以，比較重要的參考書和學術報刊，都是自費訂購。爲了留有備份，他日日以圓珠筆繁體字複寫文稿。幸好後來他的哲嗣學洛先生退休了，能夠幫助他用電腦錄入、整理文稿，這才加快了完稿的速度。

《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的大功告成，也譜寫了學術薪火接力相傳的典型範例。一九八一年九月，蔣天樞（一九〇三—一九八八）先生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出版後，卞僧慧先生便發現了書中的許多遺漏，於是，將自己所存及搜集到的資料，抄寄給蔣先生。蔣先生在進行補充修訂中，也曾想將其編撰成年譜。後蔣先生以卞僧慧在校聽過寅恪師歷史課數年，有些事情比他知道得更清晰、詳盡；又因自己「年邁體弱，無力完成」，遂將寄去之資料以及自己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貼補本和後續所得之資料，一併郵寄天津，將編纂「陳寅恪先生年譜」的重任委託給卞僧慧先生，並叮囑：「任由爲之，無庸再請示」。卞老牢記囑託，不負重望。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二〇一〇年四月，《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作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年譜長編系列」之一，得到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贊助，由中華書局出版。陳寅恪先生的親屬見到書後，十分感激，想對卞老前期支出的資費給予一點補償，以表達謝忱，也被卞老婉言謝絕了。卞老覺得作爲寅恪師的學生，能在有生之年，經過不懈努力，爲老師著書立傳，完成「宿諾」，弘揚老師的學術精神，這也是自己的榮耀。

《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是目前搜羅最全、史料最翔實、下功夫最深的一部學術專著，爲讀者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國學大師多彩的學術生涯、坎坷的人生經歷以及豁達的人生態度，都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在學術界獲得好評。與卞老相識七十餘年的北京大學教授吳小如在該書的《序》中說：「僧慧長僕十歲齡，誼兼師友，今年九十有八矣。以世紀老人艱難著述而卒底於成，視今之以逐利競名為賢者，其風操學問為南轅北轍，固無待僕覼縷指陳也。」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劉經富在《為學日損，為道日益——讀〈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一文中，指出：「以『為學日損，為道日益』為敘事線索的《陳譜》，用陳門弟子近距離接觸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和二十多年來『陳學』園地前沿研究成果，展示了譜主的心路履痕、肝膽風骨。陳寅恪一生，少無悔作，老全晚節，這是他為道日益、大德潤身的最好註腳。」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與中華書局聯合舉辦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出版學術座談會」，並以此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卞僧慧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應邀出席，並在會上深情憶述了師從陳寅恪先生的求學經歷。作爲寅恪師的老學生，此時的卞老也已年近百歲，鶴髮童顏、博聞強記，眞正創造了盛世中華學術界的一大奇跡。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二〇一三年，《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無可爭議地被評爲天津市第十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學術界同人都爲卞老高興，向他致賀，卞老卻依然如故：低調做人，扎實做事，淡泊名利，寵辱不驚。

卞僧慧先生是我們由衷敬重和愛戴的前輩學者。學習和傳承他踏實、嚴謹的治學精神，淡泊名利，努力爲中華文化事業的繁榮添磚加瓦，這也是我們後生晚輩對卞僧慧先生最好的紀念。